

※「五四 100 週年學術論壇」專輯※

從「觸摸歷史」到「思想操練」

陳平原^{*}

「人類歷史上，有過許多『關鍵時刻』，其巨大的輻射力量，對後世產生了決定性影響。不管你喜歡不喜歡，你都必須認真面對，這樣，才能在沉思與對話中，獲得前進的方向感與原動力。……對於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進程來說，『五四』便扮演了這樣的重要角色。作為後來者，我們必須跟諸如『五四』（包括思想學說、文化潮流、政治運作等）這樣的關鍵時刻、關鍵人物、關鍵學說，保持不斷的對話關係。這是一種必要的『思維操練』，也是走向『心靈成熟』的必由之路」。以上這段話，出自本人《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》一書的〈導言〉。其中三個關鍵詞（key word）——「關鍵時刻」、「觸摸歷史」、「思維操練」——是我從事五四研究的基點，既是立場，也是方法。

讀碩士及博士期間，我的專業方向是中國現代文學，這樣的專業背景，促使我長期與五四對話。無論撰寫小說史著作《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》（1988）、學術史專論《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》（1998），還是教育史書籍《老北大的故事》（1998），五四始終是我關注及論述的焦點。只不過我所理解的五四，遠不只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門前的集會遊行，起碼包括思想啟蒙、文學革命與政治抗爭三大塊。其大致進程是這樣的——醞釀於戊戌變法（1898），得益於科舉取消（1905），崛起於《新青年》創刊（1915），成熟於白話文進課堂（1920），國共分裂後「主義」之爭凸顯，眾聲喧譁局面結束（1927）。堅持從晚清與五四兩代人合力的角度立論，將五四主要理解為「新文化」的「運動」，這一點我和張灝先生的意見比較接近¹。

^{*} 陳平原，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。

¹ 參見陳平原：〈「新文化」如何「運動」——關於「兩代人的合力」〉，《中國文化》，2015年秋季號，頁49-59。

開宗明義專論「五四」的，在我只有以下兩本半書：第一，《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5 年、2010 年、2018 年；*Touches of History: An Entry into 'May Fourth' China*, tr. Michel Hockx [Leiden; Boston: Brill, 2011]），此書的雛形是二〇〇三年臺北二魚文化出版公司刊行的《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：一場遊行、一份雜誌、一本詩集》。第二，《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8 年）。前一種屬於專著，第二種帶論戰性質，二書長短及體例不一，只是在將「五四」作為思想的磨刀石這一點上，立場相同。

這裏先說那半本，也就是我與夏曉虹合編的《觸摸歷史——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》（廣州：廣州出版社，1999 年；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9 年），此書明年出增訂版，現已編輯完成。二十年前，此書甫一出版，我就意識到學生部分相對單薄。全書分「為人師表」、「橫空出世」、「內外交困」、「眾聲喧譁」四輯，分別談論老師輩、學生輩、政府官員以及社會各界。雖有傅斯年等十三人作為代表，但與「青年運動」的歷史定位相比，分量還是不夠。這回增訂重刊，我又補了十六篇，兼及政治立場的左、中、右，還有思想、文藝、學術、出版等不同領域，力圖使青年運動的面目更為清晰。書編好了，回過頭統計，發現初編十三名學生中，北大占了八個；續編十六位全部屬於北大。而總共二十四名北大學生中，國文系十名、哲學系七名，占了絕大多數；也曾反省是不是我的偏見，逐一核査，沒有發現大的瑕疵。反過來想，值此風雲突變的歷史關頭，需要的不是理智與學養，而是敏感、擔當與表達，這方面國文系、哲學系的學生，比數學系、歷史系學生占優勢。當然，這也與我長期關注教育史，對北大史料相對熟悉不無關係。

關於五四新文化運動這樣眾說紛紜的話題，確實是「橫看成嶺側成峰，遠近高低各不同」。作為研究者，你可以往高處看，往大處看，也可以往細處看，往深處看。我採取的是後一種策略——於文本中見歷史，於細節處顯精神。在《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》的〈導言〉中，我談及：「作為方法的『觸摸歷史』，不外是借助細節，重建現場；借助文本，鉤沉思想；借助個案，呈現進程。討論的對象，包括有形的遊行、雜誌、大學、詩文集，也包括無形的思想、文體、經典、文學場。入口處小，開掘必須深，否則意義不大；不是所有瑣瑣碎碎的描述，都能指向成功的歷史重建。」至於為什麼這麼做，有新歷史主義的影響，但更多的是魯迅、陳寅恪、錢鍾書等人的啟示。這點，我在〈導言〉中老實做了交代，不敢冒充先鋒與時尚。

與宏論或通史不同，《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》其實只是集中討論了一場遊行、

一份雜誌、一位校長、一冊詩集、一本小冊子，以及若干零篇。最能代表本書治學風格及趣味的，當屬第一章〈五月四日那一天——關於五四運動的另類敘述〉。此章撰寫於一九九九年三月，最初題為〈觸摸歷史與進入「五四」〉，提交給政治大學文學院主辦的「五四運動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」，收入同年刊行的《五四運動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；會議是在中央研究院召開的，但好事多磨，中間跌宕起伏，我和好幾位大陸學者是在會議第二天才匆匆趕到臺北。如此插曲，論文集序有專門的交代，足見話題的敏感以及兩岸學術交流之不易。為我的論文做評議的，是中研院近史所老前輩呂士朋先生；記得他不吝表彰，對我的研究方法及述學文體多有溢美之詞，這對我來說當然是很大的鼓勵。

我在《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》英譯本序中提及：「『五四』之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讀書人，不斷跟它對話，並非濫得虛名，主要還是事件本身的品質決定的。必須承認，一代代讀者都與它對話，這會造成一個不斷增值的過程；可只有當事件本身具備某種特殊的精神魅力以及無限豐富性，才可能召喚一代代的讀者。」實際上，二十世紀中國史上，庚子事變、辛亥革命、抗日戰爭、反右運動、文化大革命等也都是關鍵時刻，只是因為有的面向相對單純，論述思路容易趨同；有的備受壓抑，沒能得到充分發掘，其思想史意義也就受到很大的局限。在這個意義上，五四運動十分幸運，不僅塵埃未定就被正面命名，第二年起便開始認真紀念，更因立場迥異的黨派，雖心裏各有盤算，表面上都得讚賞五四青年的愛國熱情。因此，可以這麼說，這是一個被允許「充分論述」的「關鍵時刻」——至於做得到做不到，那是另一回事。

這就說到我那冊小書——書名《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》，作者用心昭然若揭。在我看來，五四的重要性在於：第一，形象正面；第二，豐富多彩；第三，意猶未盡——正因歷來眾說紛紜，方才有不斷追憶與闡釋的必要性與可能性。十年前，我在〈走不出的五四？〉（2009年4月15日《中華讀書報》）中稱：「就像法國人不斷跟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對話、跟一九六八年的『五月風暴』對話，中國人也需要不斷地跟『五四』等『關鍵時刻』對話。這個過程，可以訓練思想，積聚力量，培養歷史感，以更加開闊的視野，來面對日益紛紜複雜的世界。」

一代代中國人，從各自的立場出發，不斷地與「五四」對話，賦予它各種「時代意義」，邀請其加入當下的社會變革；正是這一次次的對話、碰撞與融合，逐漸形成了今天中國的思想格局。這裏也包含百年來國共兩黨對於五四運動闡釋權的爭

奪，如何與一時代的意識形態建構糾合在一起²。也正因此，五四不僅僅是重要的歷史事件，更是百年中國讀書人重要的思想資源，還是極為活躍的學術話題，甚至可以作為時代思潮變化的試金石。在這個意義上，「五四」之於我輩，既是歷史，也是現實；既是學術，更是精神。

如此常說常新的「五四」，毫無疑問，容易被「過度闡釋」，其中有遮蔽，有扭曲，也有意義轉移。你可以讚賞，也可以質疑，但最好不要輕言「超越」。一九四九年，天翻地覆之際，俞平伯感慨五四新文化人想做的事情，「現在被中共同志們艱苦卓絕地給做成了」；這好比是三十年前的支票，如今總算兌現了³。三十年後，俞平伯撰〈「五四」六十周年憶往事〉（此組詩初刊 1979 年 5 月 4 日《文匯報》），第十章詩後自注：「當時余浮慕新學，嚮往民主而知解良淺。」比起許多政治人物的宏論，我更認同詩人俞平伯的立場：曾經，我們以為「五四」的支票已經兌現了；其實，當初的「浮慕新學」與日後的「竹枝漁鼓」，均有很大的局限性。近在眼前的兩件事，讓我感慨遙深，一是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下午二點，臺灣大學「傳園」舉辦「傅斯年校長追思會暨紀念五四運動百周年」，有關臺大「新五四運動」的連續報導，我是從《中時電子報》等媒體獲得的；二是九月間，德國邵賓納劇院在南京江蘇大劇院上演《人民公敵》的計畫被取消⁴，原因是該劇在京演出時出現「負面效果」。後者讓我明白易卜生戲劇仍有殺傷力，一如五四時期；前者則提醒我，五四仍然可以成為旗幟。

在中國大陸談五四運動，表面上順理成章，其實潛藏著兩種陷阱：一是政府對於學潮的高度敏感與警惕，害怕學者借古諷今乃至挑起事端；二是國學熱、大國崛起以及民粹主義思潮，使得「批判傳統」成了某種禁忌。我曾談及自己幾次「馬失前蹄」，全都因為談五四——具體過程不說了，只是想想很悲傷，即便討論歷史問題，也得儘量回避敏感詞。「原本十分豐富的話題，或相當深刻的見解，為了適應現實環境，你只能點到為止，不敢深入開掘。後世學者看我們，大概會覺得很奇怪，為何說話吞吞吐吐，好像智商有問題。但另一方面，作為人文學者，我也無法

² 參見陳平原：〈波詭雲譎的追憶、闡釋與重構——解讀「五四」言說史〉，《讀書》，2009 年第 9 期，頁 157-167。

³ 參見柏生：〈幾個「五四」時代的人物訪問記〉，1949 年 5 月 4 日《人民日報》。

⁴ 參見〈江蘇大劇院：「因舞臺技術原因」德國《人民公敵》開始辦理退票〉，2018 年 9 月 11 日《新京報》。

保證一旦禁忌完全撤銷，就一定能比現在做得更好」⁵。

在〈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「五四」〉一文中⁶，我曾談及：中國人說「傳統」，往往指的是遙遠的過去，比如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國文化，尤其是孔子為代表的儒家；其實，晚清以降的中國文化、思想、學術，早就構成了一個新的傳統。可以這麼說，以孔夫子為代表的中國文化，是一個偉大的傳統；以蔡元培、陳獨秀、李大釗、胡適、魯迅為代表的「五四」新文化，也是一個偉大的傳統。某種意義上，對於後一個傳統的接納、反思、批評、拓展，更是當務之急，因其更為切近當下中國人的日常生活，與之血肉相連，更有可能影響其安身立命。

明(2019)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，無論政府還是民間，都會組織紀念活動。我之所以提前出版《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》，並舉辦相關座談會、出版討論專輯，是基於我對中國國情以及「五四言說史」的瞭解。考慮到當下的精神氛圍與學術範式，明年的五四紀念，估計熱鬧有餘而成果欠佳，不太可能取得大突破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學民間過虛歲，我們提前紀念，起碼可以說幾句心裏話。

⁵ 陳平原：〈為何不斷與五四對話〉，《文藝爭鳴》，2018年第9期，頁35-38。

⁶ 初刊《探索與爭鳴》，2015年第7期，頁20-23。

